

“选择性遏制” 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

——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黄河 刘彦彤

内容提要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关键词 选择性遏制 印太经济新框架 国家 安全与发展

美国提出和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美国先后经历了“亚太再平衡”、放弃“亚太再平衡”和转入“印太战略”等三个时期,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聚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两方面,试图通过挑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地区的海上冲突,建立孤立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阻碍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日渐上升的地区影响力。特朗普时期,美国白宫发布了《印太战略》,明确提出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持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战略矛头直指中国。拜登上台后,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对其印太愿景做出了全面概述。报告清晰表明,“印度-太

平洋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①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等经济制度促成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当前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本文以美国的“选择性遏制”战略及“印太经济新框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评估其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

从“选择性遏制”到“印太战略”

“遏制”(containment)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战略,最初由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引领世贸组织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2)的阶段性成果。

John Mackinder) 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出。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阐述并发展了该理念,他认为现代国家实力的核心在于经济能力,只要将潜在对手遏制在一个经济中心的范围内,就可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②凯南主张美国应该使用有限的实力来保障核心利益,而不要做不切实际的道德承诺。为此,美国需要界定关键利益和地区,通过联盟和重建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力来捍卫本国利益。

通常而言,政治遏制、经济遏制及军事遏制是主要的遏制方式,在实际运用中还会进行相应的组合,而针对对手采取怎样的遏制方式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一直是美国学者及政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③凯南认为,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利益也是有选择的,应当让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实现该种目标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关系。^④他在一次演讲中阐述“美国或者任何其他一国以其能量和物质产出当中经得起投入外部事务的富余部分所能成就的(事情)是有限的,比我们往往倾向于记住的更有限。因此,我们绝对必须节省我们有限的资源,绝对必须把它们用在我们觉得它们会起到最佳作用的地方。”^⑤凯南反对针对苏联的全球化及军事战略,他在撰写《回忆录》时说“当我提到对苏联实行遏制时,所指的乃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而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性的手段。”^⑥在凯南看来,在有重大地缘政治价值的地区实行“选择性遏制”,^⑦并交替使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的效果要优于“全球性遏制”。^⑧

在凯南之后,美国政治家保罗·尼采(Paul Nitze) 提出了“周线防御”(perimeter defense) 的全球战略,优先考虑全面军事力量的布局。杜鲁门时期,美国的遏制思维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杜鲁门主义形成之初,凯南通过“长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等文本,以及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推动了“选择性遏制”战略的运用。在这期间,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稳定欧亚盟国的经济来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⑨但随着冷战的加剧,尼采的全面遏制战略成了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思想。尼采是 NSC - 68 号文件撰写的主导者,认为美国应当取得在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构筑清晰的“总体防御体系”。^⑩朝鲜战争爆发后,尼

采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建设。^⑪在杜鲁门之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均采取了这种全面遏制战略,导致美国的国防预算不断上升。

关于对中国及东亚地区遏制方式的问题也颇受美国国内争议。在凯南看来,美国应当通过维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并在远东建立防御带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散”。^⑫1949年,凯南表示,如果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则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⑬NSC - 48 号文件形成了对中国的“选择性遏制”策略,即以经济贸易为重点,阻止中国从苏联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获得军用物资,并反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进行私人投资。^⑭但 NSC - 68 号文件则鼓吹在亚洲实施全面遏制战略,为此,美国先后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浪费了大量资源。

“选择性遏制”较之“全面性遏制”而言成本较低,其在实践中逐渐占了上风。美国多任政府的对外战略中都可以窥见“选择性遏制”思想的影子。例如,肯尼迪政府及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全球战略收缩,从越南撤军,转而专注对抗苏联;里根政府利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促成“和平演变”;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方式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与苏联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在冷战结束后,仍持有冷战思维的美国开始设置假想敌人,为竞争对手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国家扣上“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修正主义”等帽子,“选择性遏制”战略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重点布局存在差异,呈现出欧洲—中东—亚太的转移趋势。实际上,早在 21 世纪之初,美国政界已经开始关注印太地区及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早在 2001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指出,“亚洲正逐渐成为最可能出现对美国构成大规模军事挑战的地区……尤其是从孟加拉湾到日本以南海域的东亚沿海地区……可能出现一个拥有可观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⑮该报告表明,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但“9·11”事件令美国转移了视线,将大量战略资源运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及“民主改造”。

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国力,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奥巴马在当选总统后开始计划转移战略目标,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提出了“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选择性遏制”的思想导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具备三个特点:第一,由于亚太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美国希望借亚太地区重振美国经济。第二,中国议题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虽然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已经在走下坡路,因此美国极其重视新兴挑战者的出现。在美国看来,中国已成为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第三,美国“选择性遏制”战略设计的重心在于“遏制”中国,这直接决定着美国的亚太战略选择及其战略形成。^{①⑥}为此,奥巴马重整了联盟网络,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达成,企图打造“亚洲版北约”,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为中国设置发展障碍和准入门槛,将中国的发展遏制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之下。

特朗普上台后,继续实施全球战略收缩,一直尝试撤出叙利亚及阿富汗战场,并拒绝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单边主义的形式实现“美国至上”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以“印太”的表述取代了“亚太”,以“印太战略”承接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除了加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布局外,贸易制裁和贸易摩擦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战略手段,对中国的选择性经济遏制加剧。在这一阶段,其“选择性遏制”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正在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①⑦}美国将两国的竞争抬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外战略抱有极大的警惕性。第二,“选择性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对华发动全面的经济竞争,致力实现中美脱钩。

拜登政府则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上加紧了“印太”布局,其“印太战略”也已经走向成熟。在2022年美国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称“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承担了中国有害行为的大部分成本”,并给中国安上了破坏印太地区人权和国际法建设等“莫须有”的罪名。^{①⑧}与冷

战时期及特朗普时期较为刚性的遏制战略有所不同,拜登政府更加注重遏制的灵活性和选择性。^{①⑨}一方面,拜登重整了全球联盟网络,拉拢盟友加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和制度竞争,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另一方面,美国将对中国的科技遏制视为选择性遏制的重点内容,企图对中国进行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锁定”。美国正在强化与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部分国家等伙伴国的技术交流与供应链合作,打造以“去中国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联盟,重塑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拜登政府已然将中国视为阻碍美国继续享有霸权的最大挑战者。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麻省理工发表了关于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挑战的演讲,认为中国使用非市场手段进行贸易的情况在增加,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业和工人构成威胁。《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多次提到中国及亚太地区,指出美国应“利用联邦机构和资源来抵制中国对外国政府的援助与资助”,“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出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以及“采取措施揭露中国非市场政策的有害影响”。^{②⑩}为更有效地对付中国,美国采取了重振“大西方”,将其欧洲和亚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战略,打造“印太版北约”。^{②⑪}2022年6月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位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会。美国及其盟友称,“中国公开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系统性挑战”。^{②⑫}

2022年拜登政府正式推出的“印太经济新框架”,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选择性经济遏制的重要一环,遏制的目的并不单是阻止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物质实力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提防中国发起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军事行动。因此,“印太经济新框架”势必将会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从“印太战略”到“印太经济新框架”

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在外交、军事、经济、联盟等多个领域制定了较具详细且较为针对性的实施计划。2022年12月,美国国务院

宣布成立“中国协调办公室”,意味着美国会从经济、技术、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对中国进行进攻与遏制。²³在通过一系列经济外交完成前期铺垫后,2022年5月23日,拜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新框架”(IPEF),创始成员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以及后加入的斐济,这些国家占全球GDP的40%以及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28%,从而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层面上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

作为“选择性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印太经济新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和对华遏制的经济基础,旨在排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弥补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缺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IPEF是一项21世纪的经济安排,旨在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²⁴其涵盖范围比TPP更为广泛,主要围绕贸易、供应链、脱碳和基础设施发展、税收与反腐败等四大支柱展开:

第一,在贸易领域,成员国在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基础上做出高标准、包容、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承诺。在劳动、环境、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依据国际法、国际规则建立高标准,提高透明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竞争。与传统的贸易协定不同的是,“印太经济新框架”致力主导贸易规则的制定,而不涉及市场准入和关税减免,跨境信息流动、数据本地化标准、人工智能、劳工和环境标准等议题是贸易支柱重点关注的内容。

数字经济是IPEF框架下贸易伙伴的重点合作对象,美国将参照《美墨加协议》中的数字经济规则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与各成员国及各类型企业商讨数字规则的完善,关注跨境数据的流通性、包容性及安全性,推进弹性和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构建。²⁵2022年9月8日,为了向“印太经济新框架”输送充足的人力资本,美国商务部与亚洲基金会及各成员国政府、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启动了主要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技能提升倡议”,计划在未来十年里,向IPEF框架下的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带来700万或者更多的数字技能培训机会。²⁶

第二,在供应链领域,成员国合作建立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减少其脆弱性。成员国将共同制定和确定关键部门及货物的标准,建立类似美

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机制,通过各式渠道就供应链压力测试和瓶颈预警系统共享信息进行合作,加大对供应链弹性战略、物流管理和技术工人培训项目的投资。²⁷美国、日本等较为发达的成员国还会就供应链工作条件与国际劳工组织相互配合。²⁸在IPEF成立之前,拜登政府已经在2021年举办了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IPEF成立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召开了供应链部长级论坛,提出了“四点路线图”,推动高端产业回流,中低端产业近岸化、友岸化,主导印太地区的供应标准。

第三,在清洁能源经济领域,各成员国推进清洁能源和气候友好型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动员投资和促进低排放或零排放的产品和服务,增强能源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并共商能够推动实现土地、水和海洋、空气质量等方面可持续利用的解决方案。²⁹成员国将推动覆盖印太地区的“碳补偿市场”建设,增强印太地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尤其减少各国对中国煤炭出口的依赖,从而扩大美国清洁能源的市场。美国政府鼓励合作伙伴扩大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并主导世贸组织关于环境商品协定(EGA)的谈判。³⁰美国也会以私人融资为主、公共融资为辅的方式向印太国家提供贷款,与其盟友继续加大对东盟等经济体的新基础设施投资,开拓海外的核电市场。

第四,基础设施领域也被美国列为优先事项。美国多次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会对沿线各国造成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为了与“一带一路”倡议抗衡,争夺广阔的欠发达地区市场,同时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021年拜登总统和G7国家启动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宣称要建立“由主要民主国家牵头的以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³¹面对亚太地区需求较大的基础设施缺口,IPEF成员国将遵守在2019年达成的二十国集团(G20)质量基础设施原则,并在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更深层次的承诺,彼此共享合同信息,加强保护工人权利。为此,美国将建立公私融资的基金,用于受援国的项目建设,减少私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³²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机制,“四方安全对话”

(QUAD)已启动四方基础设施协调小组,在印太地区引领基础设施的高标准。美、日、澳等国家联合发起的“蓝点网络”计划也在为各有关政府、民营部门和其他组织树立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整套标准,并预计会与B3W相融合,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效应。

第五,在税收和反腐败领域,各成员国将制定和执行有效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通过预防和打击腐败、逃税行为,在印太地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规则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运作,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二十国集团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与合作。^{③③}美国将与各国分享专业知识、技术,探求有效的方法来提升相应的能力,完善问责体系、透明系统和信息交换平台。该支柱将与美国制定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相互配合,融入美国的多边外交、双边关系、盟友体系和海外援助之中,成为借以宣扬美式“民主”的助力与推手。

第六,在工人标准方面,为解决印太地区长期存在的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IPEF成员会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权利宣言》和USMCA中的劳工标准,并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其他议程。美国政府在执行印太地区现有贸易协定的劳工条款的同时,将为该地区的工人提供能力建设和其他计划支持,如推出工人教育、培训计划鼓励妇女和弱势群体参与劳动,并鼓励各成员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开展证明其供应链参与者的劳工实践状况的相关工作。^{③④}

为保障“印太经济新框架”以较高的回报率和支撑率顺利推行,美国一方面努力压缩遏制成本,另一方面则将该经济框架置于印太战略之下,以发挥其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效用。美国政府希望充分发挥“印太经济新框架”所创造的制度优势,改变当前的国际收益分配方案,降低对冲现存多边贸易机制、主导经济框架的成本,以充分获得国内民众和国会的支持。美国在建设“印太经济新框架”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强化“小多边主义”的联盟网络建设。以“小多边主义”的形式约束“搭便车”现象,并要求盟友与其共担旧制度的退出成本与新制度的重建成本,提升选择性经济遏制的效果,正是拜登政

府当前的行为逻辑。拜登政府将联盟视为“力量增幅器”,运用联系战略,将多领域融合,强化联盟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功能,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印太经济新框架”就是其当前强化联盟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带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印太经济新框架”正在逼迫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站边”,从而避免印太国家因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而摇摆不定。^{③⑤}例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致力在全球范围建立基础设施项目的国际评估和认证体系,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门槛。^{③⑥}利用“偏好依附”效应获得更多伙伴支持。^{③⑦}

第二,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伙伴网络。诺思(Douglass C. North)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节约成本的机制,是减少“搭便车”与成员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的制度损失的有效工具。^{③⑧}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拜登政府以低成本的价值观念为工具来构建“印太经济新框架”的伙伴网络。例如,美国一直称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是其在印太地区可靠的民主盟友,曾考虑将此三国与G7合并组成“民主十国”(D10),再次利用制度化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阵线扩展至印度-太平洋领域。^{③⑨}此外,为避免盟友保持中立,美国方面一直强调美式开放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中国政治模式之间的冲突,并直接将中美之争定义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斗争。^{④①}为达到将中国置于众矢之的的目的,污名化是美国及其盟友常常用来攻击中国的手段。人权和劳工问题成为美西方国家长期用来攻击中国的靶子,“新疆棉”事件便是美西方国家率先污蔑中国新疆存在强制劳动现象所引发的。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美国更是联合部分国家的反华政客、媒体向中国发起责难,渲染“中国责任论”,借机挑起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利用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第三,减少公共产品供给。为保护本国产业,获得国会及选民支持,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重返TPP,而是以不成熟的经济框架作为制度替代品,其向盟友和伙伴国做出的承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的整体实力正在走下坡路,在实践中往往不能与其宏大的战略目标和对别国做出的承诺相匹配,日本、印度等盟友及伙伴的经

济军事崛起也使美国越来越依赖地区联盟网络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正承受着来自国家内部的挑战。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更加反对美国政府的自由贸易和干预外国事务的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凭借“美国第一”的口号成功入主白宫,退出了TPP、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可能会令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协议,要求其盟友分担更多的地区责任。拜登政府则重拾起联盟网络,究其本质,其各项对外策略仍以“美国至上”为核心。2022年,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四方领导人联合声明》等文件中,美国以一种温和、诱导的方式要求地区盟友及伙伴在印太战略中发挥更多作用。为减少美国国内的负面声音,“印太经济新框架”对市场开放问题避而不谈,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出的承诺较为模糊,希望以提供成本较小的俱乐部产品取代负担较大的公共产品,以提供技术标准、合作协议等制度性公共产品取代开放市场、减免关税等实质性贸易公共产品。

综上所述,“印太经济新框架”是美国在当前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板块——印太地区为自己及伙伴国提供的制度替代选择,以实现模糊与自身国家战略相悖的自由贸易规则和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目的。当前联盟体系和伙伴网络的构建不仅有赖于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也离不开经济合作的支撑。美国希望继续延续其全球经济秩序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抢占在新基建、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就必须以秩序重构为手段,提出一个既能稳固地区经济霸权且付出较少成本的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新框架”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选择性经济遏制对于主导大国而言是较为适宜的战略手段。从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到拜登推出的“印太经济新框架”,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遏制战略正在走向成熟,遏制手段以规则、机制和联盟的形式呈现,遏制内容不仅涵盖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方面,还集中体现在对中国高新技术创新能力的打压。当前中国正在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格局相联系,美国也深刻意识到阻止中国的崛起需要重整地区

秩序以及破坏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目前,正是世界各国进一步加深理解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不断提升作用的成熟时机,美国此时联合广大伙伴国推出“印太经济新框架”,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必然会增加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成本和合作阻力,增加中国在印太地区各方面的竞争压力,破坏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中国台湾地区的“亲美”立场也已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印太经济新框架”预计将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持续的消极影响。

(一) 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成本与合作阻力

部分制度主义学者持“国际制度复杂性”理论,认为国际制度之间嵌套重叠、彼此平行、缺乏等级区分,有时会产生正面效应,有时则会增加竞争行为和交易成本,造成制度过剩。^①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三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复杂性。^②就成员国的组成来看,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新框架”属于制度重叠的类型,与其他区域制度或规则之间不存在等级之分,容易在相同的问题领域产生竞争关系。^③若将该框架置于世贸组织体系之下,则存在制度嵌套的现象,与其他区域性多边机制构成世贸组织体系内嵌的“俄罗斯套娃”(Matryoshka Dolls)。^④由此可见,“印太经济新框架”并不是纯粹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更类似一种美国主导的俱乐部产品,其必然会放大制度竞争的负面效应,加剧对世贸组织主导下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增加印太地区贸易流通成本,加剧制度之间竞争。

“印太经济新框架”的14个会员国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其他的经济制度安排(见表1),各国参与的双边贸易协定更是数不胜数。从该框架公布的四大支柱内容来看,其功能也与当下已有的机制领域相重叠,在美国的非中性制度安排带来的冲击下,印太地区的“意大利面碗”(Spaghetti Bowl)现象必然会更加难以消解,各种成员资格与投资规则、原产地规则交叠在一起,不仅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税收成本,也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由于部分成员国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重要的合作伙伴,该框架会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落地增添阻力。

表 1 IPEF 成员国参与贸易多边机制情况一览表(部分)

	世界贸易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东盟	中国-东盟自贸区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	√	√						
日本	√	√	√	√				
韩国	√	√		√				√
澳大利亚	√	√	√	√				
新西兰	√	√	√	√				√
印度	√							
新加坡	√	√	√	√	√	√		√
马来西亚	√	√	√	√	√	√		√
印度尼西亚	√	√		√	√	√		√
泰国	√	√		√	√	√	√	√
越南	√	√	√	√	√	√	√	√
菲律宾	√	√			√	√		√
文莱	√	√	√	√	√	√		√
斐济	√							√

注 “√”代表该组织成员国。

表格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国际和地区组织”栏目及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 资料整理所得, 参见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_681964/,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agreements-under-negotiation/indonesia-pacific-economic-framework-prosperity-ipef>。

世贸组织在 GATT 第 24 条第 5 款规定了成立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的条件, 第 6 款则规定了有关关税同盟补偿谈判的内容, 并非完全放任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签署。根据条约, 区域性贸易协定不能完全有悖于最惠国待遇, 不通过第三方提高任何贸易壁垒。“印太经济新框架”是一个松散的框架, 其本质缺乏经济活力, 不仅不会在关税减让或市场准入方面为成员国提供任何优势, 还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只对认同美式标准和价值观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开放, 违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通过制定与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高度不相容的严格标准, “印太经济新框架”正在为印太国家之间持久的贸易关系设置壁垒, 提高贸易流通的成本。美国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也必然引起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 效应, 破坏中国与成员国之间正常的供应关系, 导致成员国的进口成本增加。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将交易成本区

分为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事先成本和退出、维系、改变契约及解决冲突的事后成本。^④这种成本的增长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内, 也体现在政治往来中。“印太经济新框架”的成员国除了受到经济贸易协议制约, 还要考虑价值观、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多种因素。“印太经济新框架”强化的意识形态对垒与地缘政治风险将为中国的外交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从而提高谈判成本和维系外交关系的成本。在美国的阻挠之下, 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已经停止运行, 美国正在无视世贸组织基于规则的争端机制, 将经贸关系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 矛头直指中国。例如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单边关税, 继续在国际上打“中国台湾牌” 2022 年 9 月, 参议院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 其中就有将中国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新框架”的相关内容。^⑤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引入了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 规定若三国中任意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 6 个月后退出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并以新的双边协议取而代之。^⑥这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条款很可能在“印太经济新框架”中得到复制, 限制缔约国和第三国在自由贸易协定领域的谈判权, 从而使中国与该框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受限, 增添额外的流通壁垒。

(二) 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压力

“印太经济新框架”是美国印太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美竞争激化的产物, 具体而言, 该框架将增加中国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度及科技领域的竞争压力。“印太经济新框架”虽然被定义为一种经贸合作机制, 但其本质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是美国获取超额利益的工具, 美国等发达国家似乎正在摒弃国际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 这种保护主义思潮必然将对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有所影响。在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 下, “印太经济新框架”内部的成员国由于拥有了替代性的制度选择以及美国并不明晰的大国承诺, 很有可能追随美国一同破坏当下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与多边贸易机制; 而集团外部的成员为了谋求自身发展, 减缓消极竞争带来的影响, 也会随之扰乱国际贸易体系, 加剧世贸组织体制的失序。近年来, 中国正在加快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全球

商品交易体系。货币的定价权是一国影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能力,拥有较强的货币定价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市场动荡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体量,但却是国际贸易机制的“后来者”。^④人民币定价能力的缺失和美元的波动会冲击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人民币定价权的建立离不开中国周边国家的支持,“印太经济新框架”带来的脱钩风险,很可能阻碍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另外,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愈演愈烈。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与“印太经济新框架”相互配合,加强对华高科技产业的攻势。该法案规定在未来十年内支出28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2000亿美元)用于科学研发和商业化,大约527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研发和劳动力发展,另外给予芯片生产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该法案还规定将拨款支持《美国电信法案》的实施,加速开发OpenRAN,为除华为之外的其他供应商创立具有特定网络组件的市场,限制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在全球的产业发展。^⑤美国正对华发起新一轮芯片全面出口管制。^⑥在新政策之下,许多美籍员工被迫离开长江存储等中国芯片制造商。^⑦美国苹果公司也在政治压力下搁置使用中国长江存储芯片的计划。^⑧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加剧了中美在关键科技产业的“脱钩”趋势,同时也为芯片四方联盟(Chip4)提供了美国国内政策与资金支撑。

“印太经济新框架”的战略目标是构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对称技术力量优势和制度环境,绕开世贸组织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规则,脱离“制度嵌套”。该框架强调美国在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希望改变“制度重叠”的无等级秩序状态,令代表美国利益的经济制度获取竞争优势。制度与规则的构建也成为中美两国的竞争重点。为推动经济框架的落实,美国通过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以数字信任级别为基础的数据流通规则和新基建标准,构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壁垒。美国高度关注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在2021年以七国集团(G7)为平台发起“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配合“蓝点网络”(BDN)计划的标准和原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

性方案。东亚、南亚、中亚等中国周边地区是中国布局“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美国借“印太经济新框架”拉拢亚太国家,对中国形成经济包围圈,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对垒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持续干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常建设。

(三) 增加我国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风险

全球产业链正处在加速重塑的进程之中,但国际贸易的分工理论仍将持续发挥作用,比较优势是其中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在快速发展,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和鼓励开放的政策,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的趋势,一些外国厂商也在政治压力与利润导向驱动下向东南亚迁移,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寻求构建近岸化、友岸化、区域化的供应链体系,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规避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供应链风险。为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减少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供应依赖,2021年,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优先采购美国制造的产品,建议提高联邦政府采购“美国货”和“美国制造”的比例,并要求供应商提供采购报告。^⑨全球产业链布局正在由成本导向转型,安全因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⑩“印太经济新框架”下的供应链支柱强调要增强成员国的供应链弹性与安全,实质是想使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达成联盟内部的供应链互补合作,加快中低端产业从中国转移的进程,削弱中国“全球工厂”的地位,实现供应链“友岸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业布局、相关政策可能在短期内难以适应这一变化,一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迁出将增加国内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某些企业的外移很可能影响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从而导致产业集群整体迁移的连锁反应。

中国研发投入正在连年快速增长,投入规模仅次于美国。^⑪但根据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国国内ICT企业和跨国ICT企业的产品出口仍处于“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中间底部,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高度依赖中间投入的组装产品。^⑫这意味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低端位置,缺乏核心技术,在发达国家的封锁

下,很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局面,难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印太经济新框架”相对应,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日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EPC)也强调加强在半导体出口管制、投资、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对抗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带来的威胁。美国已经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1 战略竞争法案》等文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蓄意设置政治门槛和投资限制,封锁中国核心产业链。当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业迁出、高端产业发展不完善的困境,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脱钩及技术封锁将阻碍中国通过产业升级对冲产业转移风险,从而遏制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增长。^{⑤7}

(四) 损害我国核心利益

拜登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为牵制中国大陆,美国政府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拉拢中国台湾当局加入自己的阵营,派遣军舰穿航台海,增加对台军售的次数,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2022年,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更是激化两岸的矛盾,在台期间,佩洛西主张尽快通过“芯片法案”,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民主等领域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被纳入Chip4联盟,成为美国政府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区之一。美国政府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预计提供总额520亿美元的一揽子补贴,为芯片制造工厂的建设提供更多资金。在这项政策的激励和政治施压下,台积电决定扩建和升级该公司正在菲尼克斯建设的美国生产中心,计划在当地建立第二家工厂,以更高端的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智能设备为供应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正在转移中国台湾地区的优势产业,弥补本土高端制造业的不足,吸收中国台湾地区的就业机会、外汇收入、税收以及两岸的技术性人才。

中国台湾地区虽然不是“印太经济新框架”的成员,但也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印太经济新框架”启动后不久,美国和中国台湾便正式开启谈判,其谈判内容、方式基本与“印太经济新框架”一致,可以被视为中国台湾地区被实质性纳入该经济框架的补充。美国正在通过强化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经贸合作,来弱化海峡两岸的联系,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结 论

“选择性遏制”思维为深入理解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当前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及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正在加速印太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变,中国及部分新兴国家对建立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及地区秩序提出了要求,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地缘霸权主义发生了碰撞。美国“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色彩,其构建的印太联盟体系也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与进攻性。经历多任政府的调整布局,美国“印太战略”已经走向实体化、制度化、全面化。美国及其印太盟友在安全防务、经贸科技、数字经济、供应链等一系列议题上达成共识,并展现出遏制中国。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新框架”是美国对华一贯持有的选择性经济遏制思维的升级版。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美国政府相机选择将经济作为主要的遏制领域,以“印太经济新框架”为载体,在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高新科技发展等方面打压中国,而在气候治理等次要议题上则留有与中国进行沟通的余地。

愈演愈烈的大国竞争正在打击以合作为基石的多边主义,在不断升级的危险动态的刺激下,技术进步、金融风险、全球公共产品私物化等因素使国家竞争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美国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多边机制的倡导者,在面临挑战的同时,逐渐转向修正主义和保护主义。自冷战结束,经贸合作与发展援助被再次视为改变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印太经济新框架”的出台,无疑将加重印太地区的“制度过剩”,在国家之间的资金流通、技术传播上建起“小院高墙”,妨碍世贸组织职能的有效发挥,加剧国际社会中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常运作,带来产业链、供应链脱钩风险,危及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美国经济遏制带来的消极效应,化解“零和博弈”风险,维护本国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应当认识到,“印太经济新框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印太国家普遍希望拥有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在贸易协定中获得实质性好处,

而“印太经济新框架”并没有提及削减关税和市场准入等贸易政策便利,缺乏解决该地区发展和贸易问题的实际举措,因此对成员国的吸引力是较为有限的。创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拒绝签署贸易支柱的谈判协议,明确表示印度目前在环境、劳工、数字贸易和公共采购等方面与其他成员国缺乏更广泛的共识。韩国、东盟国家对中国供应链存在较强的依赖,完全加入“印太经济新框架”并不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主导 CPTPP 是日本当前的区域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实现日本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退出 TPP 后,为了推动谈判进程,CPTPP 总体上放宽了对成员国的限制,“印太经济新框架”再次加剧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极有可能冲击日本的印太构想。对于美国自身而言,完全与中国脱钩也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双方经贸早已深度融合。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统筹内外驱动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对“印太经济新框架”带来的挑战,除了要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升综合竞争力,打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还要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为此,一要发挥“磁铁效用”,用庞大的市场资源、完善的产业政策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减弱产业过快转移的趋势。二要弥补中国在规则制定上的短板,在制度竞争之下,只有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才能谋求自身发展的主导权,摆脱竞争对手的遏制。这需要中国继续积极通过联合国、世贸组织等现有机制参与国际事务,并从发达国家规则制定的经验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要继续和印太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区域一体化建设是当前印太地区的发展目标之一,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近期签订 RCEP、召开 G20 及 APEC 峰会的契机,与东盟国家深化自贸区建设,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寻求利益契合点,并向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提供软援助,不放弃与“印太经济新框架”成员国的接触、合作。四要充分发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优势。“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其项目并没有附加政治条件,更容易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中国应探寻“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国家发展战略可以对接的空间,充分彰显大国担当,传播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五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为金融强制脱

钩风险做准备。想要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经济脆弱性,中国必须提高人民币的定价能力,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全球商品交易体系,加快推出中国人民银行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

- ① ⑱ The White Hous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 ②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4—7 页。
- ③ 任东来《凯南的遏制思想与美国的遏制战略》,《美国研究》1996 年第 3 期。
- ④ T. H. Etzold and J. L.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 - 1950*,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78, p. 113.
- ⑤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30 页。
- ⑥ G. F.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New York: Pantheon, 1983, pp. 358 - 359.
- ⑦ 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21 页。
- ⑧ ⑩ 黄河《“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 ⑨ J.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2, pp. 40, 37, 84, 62 - 63.
- ⑪ “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14 April, 1950, FRUS 1950(1), p. 254.
- ⑫ “9NSC68/3: The Strategy of Freedom”, 11 December, 1950, PPS Records, Working Papers, Box 58.
- ⑬ “PPS / 13, Resume of World Situation”, 6 November, 1947, FRUS1947(1), p. 771.
- ⑭ “The Far East: China”, 1973,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9), pp. 826 - 834.
- ⑮ 姜彦名、王传辉《浅析冷战初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法制与社会》2008 年第 33 期。
- ⑯ 陆俊元《美国对华地缘战略与中国和平发展》,《人文地理》2006 年第 1 期。
- ⑰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p. 8.
- ⑱ 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5 期。
- ⑳ “The 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s/117/1016>.

- tps://schrader.house.gov/uploadedfiles/america_competes_act_of_2022.pdf.
- ②① 张文宗、王靖元《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4期。
- ②②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 ②③ 李巍《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
- ②④ The White House,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 ②⑤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September 9, 2022,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20Pillar%201%20Ministerial%20Text%20\(Trade%20Pillar\)_FOR%20PUBLIC%20RELEASE%20\(1\).pdf](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20Pillar%201%20Ministerial%20Text%20(Trade%20Pillar)_FOR%20PUBLIC%20RELEASE%20(1).pdf).
- ②⑥ “IPEF Upskilling Initiative,” September 8,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Upskilling-Fact-Sheet.pdf>.
- ②⑦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I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I-Ministerial-Statement.pdf>.
- ②⑧②⑨③④ Matthew P. Goodman, William Reinsch, “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January 202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20126_Goodman_Indo_Pacific_Framework.pdf?ee-GvHW0ue_Kn118U5mh0pSjLs7DfJMaN.
- ②⑨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II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II-Ministerial-Statement.pdf>.
- ③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 ③③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V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V-Ministerial-Statement.pdf>.
- ③⑤ 王卓《介于 TPP 和 CPTPP 之间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的另起炉灶、日本的追随与中国的应对》，《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 ③⑥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lue Dot Network” <https://www.state.gov/blue-dot-network/>.
- ③⑦ 偏好依附效应：一种动态网络增长模型，表现为有着更多连接的节点相比于连接更少的节点会有更大可能性而获得新的连接。
- ③⑧ H. B. Mayo, “The Western Alliance—Ideological or Defens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 9, No. 2(1954), p. 94.
- ③⑨ 汤立斌《美媒：西方拼凑“民主十国”恐难如愿》，参考消息网，2020年12月29日，<http://m.cankaoxiaoxi.com/column/20201229/2430769.shtml>。
- ④① “Ongoing Battle Between Autocracy, Democracy in Today’s World: Biden,” *The Print*, May 4, 2022, <https://theprint.in/world/ongoing-battle-between-autocracy-democracy-in-todays-world-biden/941663/>.
- ④②④③④④ K. J. Alter, S. Meuni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1(2009), pp. 13–14, p. 15, p. 15.
- ④⑤ 王明国《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
- ④⑥ 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70页。
- ④⑦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BS%20Taiwan%20Policy%20Act%20FINAL%20\(1\).pdf](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BS%20Taiwan%20Policy%20Act%20FINAL%20(1).pdf).
- ④⑧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7/1/20 Tex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32_Exceptions_and_General_Provisions.pdf.
- ④⑨ 黄河、谢玮、任翔《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 ④⑩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https://science.house.gov/imo/media/doc/chips_and_science_act_leadership_fact_sheet.pdf.
- ⑤① A Rule by the Industry and Security Bureau on 10/13/2022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2/10/13/2022-21658/implementation-of-additional-export-controls-certain-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
- ⑤② “China’s YMTC Asks Core US Staff to Leave Due to Chip Export Control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4,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97147102-a02c-48df-b3a0-28c77c4c29f>.
- ⑤③ “Apple Freezes Plan to Use China’s YMTC Chips Amid Political

- Pressure”, NIKKEI Asia, October 17, 2022,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Tech/Semiconductors/Apple-freezes-plan-to-use-China-s-YMTC-chips-amid-political-pressure>.
- ⑤③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the Future Is Made in All of America by All of America’s Workers”,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the-future-is-made-in-all-of-america-by-all-of-americas-workers/>.
- ⑤④ 刘友金、李玮瑾《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⑤⑤ 魏玉坤、欧立坤《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新华社, http://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595.htm。
- ⑤⑥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e/00gvcdvreport2021e.pdf.
- ⑤⑦ 李巍、王丽《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战略探析》，《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黄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刘彦彤,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丁道文)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of Selective Containment Strategy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Huang He, Liu Yantong

Abstract: Since containment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by George Kennan, it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successive American government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US has shifted its strategic focus to the east and targeted its containment target at China. In order to suppress China, the U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selective containment” strategy, united its European and Asia-Pacific allies to jointly contain China, and formed a containment network with China throug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and other economic mechanisms and system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try to frame Chin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strong exclusiveness and pertinence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and the support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t will inevitabl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selective containment;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countr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